

在平行線的相交點上 ——懷張灝兼談幽暗意識

● 陳方正

去年英時兄黯然離世，今年張灝兄又歸道山，雖然聽聞他健康不佳已經多年，但消息傳來，仍不免感到突兀和愴然，因為他們的年紀委實相差了好一大截！無論如何，兩位都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的創刊編委，從頭便鼎力相助，對我們這本刊物嘉惠良多，是我衷心感激的。

說來奇怪，我和他們兩位的劍橋歲月幾乎完全重疊，都是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那七八年之間。那時我埋首於物理學，但也儘有機會認識一些文科方面的中國人，例如在哈佛大學拉蒙圖書館(Lamont Library)前面小路上碰到的成中英，一位瘦弱的哲學系研究生；在中國同學聚會上認識的考古學家張光直，篤實中透着自信；口吻謙虛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邏輯專家王浩；還有不拘細節，豪邁如男子漢的陳幼石，等等。而且，日後因為各種不同原因，和他們也都有若干交往。不過，人的緣分是很奇怪的。當時我有機會和英時兄相晤和傾談，只不過是由於一位間接認識的朋友之引介，正所謂傾蓋如故，其後他到香港中文大學來主

持校政改組工作，從而相熟，自此雖然遠隔重洋，睽違經年，卻逐漸成為相知朋友。至於張灝兄，則不但當時失之交臂，無緣識荊，而且此後雖然在1991年的夏威夷之會和1993年的斯德哥爾摩之會上都曾經碰頭，卻都沒有留下深刻印象，直至上世紀末他從俄亥俄州立大學退休然後來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方才算是認識，那已經是我們的劍橋歲月之後將近四十年了！

況且，我雖然從90年代開始，就着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比較研究，但半路出家，無暇觸類旁通，只能夠閉門造車。因此，說來慚愧，張灝兄



2005年，張灝教授榮退學術座談會上留影。左起李歐梵、陳方正、張灝、余珍珠、陳建華、張隆溪。(圖片由陳方正提供)

* 本文為筆者為《幽暗已成千古患：張灝教授紀念文集》撰寫的文章，即將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有關清末思想變遷的兩部英文專著雖然放在書架上多年^①，卻從未詳細拜讀，就連他著名的「幽暗意識」之說雖然聞名已久，也只是從他離港返美前夕相贈的自選集^②中得知梗概。幸運的是，蒙許紀霖和項武忠兩位先生不棄，推薦我為此紀念文集撰稿，這才得以對張灝兄和他的思想增加認識，並且抒發一些感想。可惜故人已然乘鶴歸去，再無請益機會了。

在上世紀60年代，毫無疑問，麻省劍橋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鎮。當時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所攪起的軒然大波已然消散，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風華正茂，他們所領導的東亞研究也進入黃金時代，門生故舊開始進駐全美學術要津，例如張灝兄的論文導師，以嚴復研究知名的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便是費公的嫡傳弟子；而像他一樣，以梁啟超為博士論文题目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也出於費公門下。說來匪夷所思，像我那樣一個來自香港的理科毛頭小伙子，由於導師的好意居然也曾經被帶到費公在溫特魯普街(Winthrop Street)家中每周舉辦的下午茶會——雖然當時我對此老可謂茫無所知；而再次有緣拜見費公，則是將近三十年之後在「費正清中心」參加他的八十大壽茶會了。

所以，以近代史為志業的張灝兄當時真可謂風雲際會，在適當的時候來到了適當的地方。不過，費公以研究清史檔案起家，學術研究以具體的人事和政治變革為主，這大概也可以視為「費正清學派」的特色；至於史華慈則別樹一幟，治學興趣在文化淵源和思想史方面。這很自然地，也成為了列文森和張灝兄兩位學者的梁啟超研究之分野^③：前者追溯、考證和縷述任公一生事迹，後者則着力於詳細分析其思想背景、來源與變化，故此他的論述僅以梁氏思想最活躍、變化最激盪的時期(1890-1907)為限。

這個分野多少決定了張灝兄一生治學方向，而且，它還有一個不斷追尋根源與意義的

趨向，那在他論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劉師培等四位思想家的1987年專著就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了^④。其實，這個趨向也是由此書題材本身所決定的，因為這幾位學者在建立於傳統儒學上的政治秩序行將崩潰，而對於西方學說又尚未有深入認識之際，在惶恐中只有向正統學說以外的各種傳統思想尋求出路。此所以在書中自《公羊傳》、《荀子》、陽明學、泰州學派，以至瑜伽行唯識學等各種思想流派都紛至沓來，蔚為大觀，而張灝兄的工作就在於一一梳理、辨析這許多不同駁雜的學說在當時所被賦予的新意義和各自所發生的特殊作用。在書的總結中他強調，這幾位學者的思想都不僅僅停留在改良、革命、民族主義等實際問題層面，而還有其道德與精神的深層次意義。事實上，這個觀察大致上也標示了他在同時進行的下一階段工作。

短短兩年以後，他出版《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⑤，那當是他最為人知，也影響最大的一部論文集。在此，他從思想史研究轉向了深層的政治觀念剖析^⑥。根據他的自述，這個轉向的根源來自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在1962年一次演講的啟示，此後不久他因為接觸到30年代革命文學而受其影響，一度發生左



張灝教授最為人知的著作《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資料圖片)

轉傾向，最後卻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猛烈衝擊而刹住了這個轉向——他被迫直面人性中的黑暗深淵，從而領悟民主制度的要義是在於制衡人性中無法根除之惡。這樣，通過對民主更深一層的了解，他得以重拾對於民主自由理念的信心。當然，他這個曲折思想歷程的起點是赴美之前，在台灣大學自由鬥士殷海光先生門下那段意氣高昂的崢嶸歲月。不記住這個起點就難以明白，為甚麼他要強調，「在中國談民主，常常需要一個低調的民主觀，才能穩住我們的民主信念」了^⑦。

然而，世事無常。在過去十來年間，美國眾開國元勳在兩個世紀前所苦心經營的民主制度雖然周詳細密，卻已經逐步淪為黨爭工具，甚至法院和選舉體制也未能倖免。而且，看來今後數年間這個鬥爭還將愈演愈烈，不知道伊于胡底。對此沒有人能夠預料的鉅變，身處其中的張灝兄當不能不洞悉，並且生出很深感觸，甚至一些疑惑來吧？其實，基督教信仰就曾經牢牢盤踞西方人心靈千年之久，甚至一度與政治體制緊密結合，當時人人奉之為天經地義，更為之提出過無數嚴密論證。但自從啟蒙運動興起以來，它土崩瓦解，逐步喪失思想上之主宰地位的大趨勢就再也無法阻擋了。從此看來，以無論如何成功的政治制度為不可更易之信念，恐怕還是需要仔細商榷的吧——但很可惜，時光流逝，這已經變為不可能了。

令我感到無比驚訝和感慨的是，張灝兄和我所曾經分享的，其實遠遠不止於50、60年代的劍橋歲月，而還有30、40年代的重慶歲月——先父陳克文在行政院任參事，家在歌樂山，張灝兄先大人張慶楨在中央大學當教授，家在沙坪壩，因此我們兩家都經歷過日本飛機的大轟炸，都跑過警報，甚至同樣遭受過回家只見頹垣敗瓦的慘痛（我當時尚在襁褓之中）；以及40年代末的南京歲月——在1948年先父和他先大人分別當選廣西和安徽的立法委員，翌年我們家經桂林、廣州來香港，他們家則經上海

去台灣^⑧。所以，我們的生命軌迹倒真有點像兩條十分相近而不相交的平行線，只是在他歸道山之後，由於這本紀念文集的機緣，我們才終於真正相遇和認識，但這只能夠是在人世以外的另一個空間裏面了。畢竟，在非歐幾里德空間之中，平行線的確是可以相交的。

註釋

① 即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Taipei, 1979) 和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Taipei, 1987)。兩書原版都在美國出版（前者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1971年出版，後者由加州大學出版社於1987年出版），我當時在香港購得的是台灣翻印版。後者有下列中譯版：張灝著，高力克、王躍譯：《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張灝：《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③ 張灝的梁啟超研究參見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列文森的梁啟超研究參見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④ 即前引《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

⑤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⑥ 這是指《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最重要的開頭兩篇論文而言（〈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超越意識與幽暗意識——儒家內聖外王思想之再認識與反省〉），其篇幅佔全書大約三分之一，書中其餘文章與此相關，但重點不一樣。

⑦ 有關他的思想歷程見前引《張灝自選集》，頁4-7；有關他與殷海光先生的深厚師生情誼，見例如張灝：〈殷海光與中國知識分子——紀念海光師逝世三十周年〉，載《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237-42。

⑧ 參見李懷宇：〈張灝：探索時代〉，《思想》，第19期（2011年9月），頁309-14。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